

强军故事会·特别策划

147天

ICU里的生死拉锯

147天,于普通人来说是近5个月的光阴流转,对王戟而言,是21万余分钟的黏稠停滞。

在重症监护室,他是在被闷疼拽醒的。钝重的痛感从骨髓里渗出来,一下一下漫过周身。一旁的监护仪,日夜“嘀嘀”响着。

他最先察觉到的异常,是身子轻了——被子覆盖的轮廓,缺了一块。手伸进被子慢慢探下去,在大腿本来的位置只摸到了纱布、床单……

2013年1月23日,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,从胸口到腿根,血管壁被撕开。手术叠着手术——

1月24日,主动脉置换;
1月25日,左小腿切开减压;
2月1日,双下肢截肢;
3月11日,右下肢再次截肢;
4月10日、17日、26日,清创、清创、清创……数到后面,没有人能记得清,只知道一个残酷的事实:眼前的这位军人,再也无法站起来了。

王戟近半生的科研攻坚,始终是站着走过来的。他站在队列里,站在讲台上,站在科研阵地上……

可此刻,他陷进病床的白色被褥里,成了一具找不到支点的躯壳,下意识想并拢脚腿,却再也摆不出笔挺的军姿。

手上的留置针换了又换,针孔叠着针孔。

从前他是追时间的人,如今时间成

了最沉的枷锁。

监护仪的“嘀嘀”声一下一下,砸在耳膜上,像没有尽头的钟。他试过数着声响入睡,但睁开眼发现,仅仅过去了几分钟。

王戟的眼眶地红了。他没说什么,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清醒的日子多了,他先拿来学生的论文修改,又翻起医书,问药名,问指标,问术后恢复的每一个细节。他这辈子都在破解科研难题,这一次,他想破解自己身体的难题。

王戟还想站起来。

他专程到北京的医院,给自己装了假肢,扶着康复室的双杠,一步一步挪动。真能走几步的时候,他特意让人拍视频,发给家人、朋友和医生。

那几天,他没说什么,但谁都能感觉到,王戟的心变亮堂了。一时间,能再次看到王戟站起来的样子,成为大家的心愿。

可假肢太重,走几步,王戟的腰上就渗出汗珠。不到300米的一圈路,他要走整整1个小时,每天至少走3圈。医护人员说:“从没见过这么拼的病人。”

最终,王戟把假肢脱了下来,对身边人说:“同样的力气,花在科研上,能做的事更多。”

真正努力站起来过,就能踏实坐下了。这不是轻飘飘的“与命运和解”,而是冲锋半生的人,精准算出了自己的生命方程——把有限的能量用在最值得坚守的地方。

0.2平方米

一个军人的战位

0.2平方米有多大?

3张A4纸并排铺开,几乎盖住王戟的轮椅坐垫。坐垫正中有一个凹陷的坑,再也弹不回去。

王戟的双肘,长年抵着轮椅扶手边缘,使黑色皮面皴裂翻卷,磨出一道半指宽的浅白印子,像一条看不见的边界线。

线以内,是他的战位。探身、伸胳膊,他要计算好角度、距离,才能够得到身边的论文和书本。

线以外,是他熟悉的实验室。曾经的他步履如风,三两步就能跨上台阶;连续熬几个夜,脚步照样轻快。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:要做中国自己的高可信软件。

什么是高可信?

“可靠”不够,要“可信”,再确切一点,是“高可信”。

软件像人一样会“生病”。一行错误指令,能让舰船在风浪中失去动力;一个系统缺陷,足以让航天测控在关键时刻丢失目标。信息化战争中,软件一旦出错,后果就是灾难。王戟,就是这个领域里的“软件良医”。

当外界追逐算力的浪潮、硬件的迭代时,他几十年如一日,坚守在高可信软件技术这条“冷门硬核”赛道上。他手中的“诊疗器”,是他耗尽心血锻造的软件工具集。这套工具治的不仅是寻常病痛,还有深埋代码中的点点病灶。

上个世纪末,国内对高可信软件技术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,是导师陈火旺院士和王戟率先提出这一概念。后来,王戟在国防科大首开相关课程。教材是他写的,标准是他定的。那时候,他的战场仿佛铺得无限远。

接受采访时,他笑着低头瞥了眼身下,对记者说:“我就这样,被轮椅困住了。”

真的被困住了吗?

经过一年多的康复训练,王戟带着微笑,摇着轮椅回到了校园。刚回来没多久,他就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。

这是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的战

略制高点,相当于国家的“科研勘探队”,专挖学科底层的理论富矿,为未来一代国防装备的技术突破打牢底座、探明路径。

当时,在全军软件技术领域,这样的项目仅此一项。选谁挂帅,直接决定了这块地基能打多深、多坚固。

王戟接下这副担子的消息传开后,大家都替他捏着一把汗:胸腹还留着长长的疤痕,连坐稳轮椅都还在练习的人,能扛得住这种级别的压力吗?要知道,首席专家不仅要把控技术方向,还要跨单位协调、到一线调研、参加数不清的论证评审。这强度,他能否顶得住?

初次听他报告的人,目光总是先落在轮椅上——军装挺括,裤管平整地叠在坐垫上。可等他开口拆解技术方案、点破攻关路径,三两句话,那些悬在轮椅上的顾虑,都跟着他的思路飘走了。

项目攻坚的那6年,他的日程排得比生病前还满。会议室里他一待就是七八个小时,面前经常放着一杯水,但从开场到散会,杯沿都没碰过一次。从会议室到卫生间,轮椅要转4个弯、过2扇门。他不想让任何人停下手里的活,陪他走这一趟。

6年里,他出差70余次。论证会、节点评审、验收答辩,凡首席专家必须到的场合,他一次没落下。一年冬天,他独自飞往北京开会。不熟悉他的参会者,看见他摇着轮椅进场,目光扫到空落落的裤管,当场倒吸一口凉气。

没人听他喊过苦。团队成员劝他歇歇,他只淡淡地回一句:“我想试试自己还行不行。”

2021年,项目顺利通过验收。评审结论白纸黑字写着:整体技术水平国际前列、国内领先,部分指标国际领先。

那一天,他的脸上浮现了笑容,依旧是往日那般安静的模样。那只全程没动过的水杯和桌角压着的验收报告,静置于暖阳中,仿佛守着一个沉默的约定。

王戟的「数字人生」

■本报记者 楚亚楠

日前,“时代楷模”王戟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广为传颂。命运一次次沉重叩击,不断考验着王戟。那些没有将他击倒的苦难,都化作生命的台阶,托举起一个更加挺拔的灵魂。回望这段布满艰辛的路,一组数字镌刻下他所经历的磨难,也打开了我们理解他的一扇窗口。本期,让我们循着这5个独特的数字,读懂王戟。

——编者



每周3次

被透析切割的日子

某国防973项目紧锣密鼓验收的最后一年,一张薄薄的诊断单,再次给王戟的人生蒙上一层阴霾——尿毒症。

周二、周四、周六,一周3次透析。冰冷的数字,强行切入他紧凑的科研节奏,彻底改写了他的时间秩序。

曾经,为了不给人添麻烦、不中断科研进度,他全程滴水不沾。如今,医嘱严格限定,每日摄入量不超过500毫升。

饮水、进食,他都要掐着刻度精准计算。普通人最寻常的口腹之欲,对他来说却充满禁忌。

没有完整连贯的科研、教学时段,他的全部日程都要围绕着透析时间安排。每次治疗结束,疲惫如期袭来,他只能在身心透支的缝隙中,一寸寸抢时间。

每到透析日,王戟熟练地将轮椅滑到病床边,靠上肢发力支撑,稳稳挪动身体,再静静躺卧、盖好薄被、等待治疗。

胳膊上错落的淡紫淤青,一道近10厘米的褐色陈旧瘢痕,是经年反复穿刺留下的印记。针头刺入皮肤

的刹那,他眉头轻轻一蹙,随即舒展。疼痛,早已是日常。

病房天花板的灯光一格一格匀净落下,窗外浏阳河缓缓流淌,洪山桥静立水面。机器嗡嗡轻响,血液顺着管路汩汩循环。

旁人视作煎熬的透析时光,却是王戟平日最沉静的独处时刻。那些悬而未决的项目堵点、学科发展的前路、学生论文的症结,在平稳的循环里梳理成型、脉络分明。

多数时候,他是师者、是攻坚者、是领路者。然而,当透析机规律的“嘀嘀”声响起时,那个被他极力掩盖的身份,就会自然浮现——他是一个需要终身与病痛共处的病人。

或许外界默认他在咬牙坚持、苦苦煎熬,可于王戟而言,从无“硬撑”二字。

命运一次次压缩他的生活半径,身体的边界被数字层层加码,可报国的忠心、治学的初心、求索的恒心,从未收缩分毫。

当洁净的血液重新回流四肢,王戟的世界再一次被一个个科研项目填满,给病房的人们留下匆匆赶路的身影。

在王戟的人生坐标系上,“43”是两重重合的刻度。

一是岁月:今年是他踏入国防科大校园的第43个年头。

一是薪火:重病归来后,他亲自带了43名硕博研究生。

博士生李明龙刚成为王戟的学生时,对导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严。王戟指导学生时很少用幻灯片,而是让学生在白板上用马克笔推导。李明龙每次站在白板前都很紧张,因为身后导师紧盯着每一行公式,逻辑稍有差池就会被立刻叫停。

昔日的学生、如今的同事刘万伟,跟着王戟在白板前走了20多年。2005年,他刚读博就鼓起勇气提出:想尝试改进某项算法。王戟沉默片刻说:“这条路不好走。如果你下决心做,我陪你一起。”

这一陪,就是4年。无数个深夜,会议室的白炽灯下,经常只剩师徒二人对着白板推敲。最艰难的一个步骤,他们反复琢磨,推导了八九个月,也没半点收获。刘万伟甚至想过放弃,王戟却不疾不徐,找来一本书递给刘万伟:“看看这个,也许会有启发。”

王戟说,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,他的导师也这样辅导过他。

王戟住院时,他的学生们轮流在病房外守护。那天深夜,刘万伟翻开陪护

记录本,看到前一个陪护的人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道:“王老师,今夜平安。”

采访时聊起这一幕,一滴泪卡在刘万伟眼角的褶皱里,迟迟没落下。他用手背抹了一下眼角,说:“那会儿,只盼老师平安。”

所有学生都默认,迈过这道坎,导师应该会慢下来。可重回白板前的王戟,节奏反而绷得更紧:召集学生在白板前推导的次数更频繁了;透析间隙,他也总攥着改好的论文跟学生核对细节。

13年过去,刘万伟已成为教员,也渐渐读懂了导师日益加重的急切。

高可信软件这条路“冷、难、慢”,要靠一代代人接棒走下去。王戟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,只希望学生们能把接力棒攥得更紧一点。

这份急切,是刻在师承里的责任。王戟常用的白板,正是从导师陈火旺院士手中接过来的——当年银河团队在艰难中攻坚,也是靠着一块白板、一支笔。

白板擦了又写,一届届学生来了又走,这份底色也跟着传了下去。

当年攥着马克笔神情紧张的年轻人,如今大多成了领域里的中坚力量。有人留校执教,和王戟并肩作战;有人奔赴一线,把这套治学之道带去了更远的地方。

13年

一个家,兵分三路

距离王戟那场重病,已过了13个年头。这个数字拆开看,也正是这个家的样子:一个家,兵分三路。

13年里,一家人围着同一台轮椅,走了很远的路。

最先握住轮椅扶手的,是王戟的母亲刘桂枝。

她一辈子要强。她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,后来成为某工厂技术骨干。进入晚年,她的日子却围着两辆轮椅转:2008年老伴王心患病瘫痪,家里添了第一辆;5年后儿子王戟死里逃生,屋里并排摆上了第二辆。

儿子出差,她跟着下楼,扶着把手慢慢推。轮椅的轱辘轻轻碾着地面,她盯着面前那个蜷缩的身影,眼泪悄无声息地流。

王戟没有回头,只顿了顿,柔声说:“妈,别这样。我总要面对的。我过得很充实,这不是很好吗?”

她擦了泪,推着轮椅继续向前。

轮椅碾过水泥地,碾过一个母亲的晚年,也碾进一个孩子的童年。

读小学一年级时,王戟的女儿写了一篇充满奇思妙想的作文《能走的轮椅》:给爸爸的轮椅装两只脚,轮子和椅身之间嵌一块磁铁,要爬楼的时候,磁铁一吸,轮子换成“脚”,爸爸就不用麻烦了。

读小学五年级时,爸爸去南京治尿毒症,妈妈赴天津攻坚重要课题,没人照顾的她只好休学,成了妈妈的“小跟班”,学会了递扳手和贴标签,逗笑了疲惫的大人。

没人盯她写作业,也没人追着给她补功课。她只是望着轮椅上爸爸笔直的身影,学着妈妈遇事不慌的样子,懵懵懂懂跟着往前赶。小时候看见爸爸妈妈的奖章,她总憋着劲想超过他们。现在她只想快点长大,能稳稳握住轮椅把手,替妈妈多推一段路。

整整13年,推着这台轮椅稳稳走下来的,是王戟的妻子黄春。

她身上裹着一层安静的气质,说不清是岁月磨出来的平和,还是疲惫到极致后的克制。说话间,她总不自觉地捏

鼻梁,一下又一下捏同一个地方,捏到泛红。

黄春的日子,是一道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。

先送丈夫上班,还是先送女儿上学?选前者,孩子会迟到;选后者,丈夫赶不上热早饭。

带女儿去天津,还是留下来?重大项目攻关,她是主任设计师,必须顶上;带上孩子,就会耽误孩子的学业。

两头都是牵挂,两头都放不下。

她总说:“每个位置都要有人守住。”她守的又何止是一个位置呢?

13年里,没有一个身份允许她擅自“离岗”。每一道选择题,都要在天平两端掂了又掂。她只说了两句话:“只能这样选”“不可能事事完美”,语气轻得像一层薄雾。

说这些话的时候,她捏鼻梁的动作没有停,指尖越捏越重,关节悄悄用力,红痕从鼻梁漫到眼角。那句话好沉,卡在她喉咙里,好像一张嘴就要滚落出来——“我真的好累。”

她也只是个普通人,也会有那么几个瞬间想卸下所有身份,做回能倚在丈夫肩头的女人。这样,她就不用对着病危通知书故作坚强,不用在爱人的治疗和女儿的学业间反复权衡。

倘若她真的停下来歇一歇,谁又忍心苛责她半分?谁又舍得催她再往前半步?

可她没有。她只是一下一下捏着鼻梁,用那一点尖锐的、生理性的疼,把翻涌的情绪、到了嘴边的软弱,一点点按回心底。

王戟都懂。

正因为懂,他才不肯停下来。他知道,自己多自理一分,妻子的担子就轻一分;自己往前进一步,她悬着的心就降一寸。

残肢疼得钻心时,他会拨通妻子的电话。通了,他却不说,就沉默几秒。妻子什么都明白,王戟也知道她什么都明白。

挂断电话,黄春望向窗外的雨,低声说道:“王戟的残肢,一定又在疼了。”